



聚焦梁启超、陈独秀、鲁迅、
胡适、茅盾、巴金等六位作家

中国现代 六作家论

李 伟 著

非外借



人民出版社



聚焦梁启超、陈独秀、鲁迅、
胡适、茅盾、巴金等六位作家

中国现代 六作家论

李 伟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中联学林

责任校对:张明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六作家论 / 李伟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

ISBN 978-7-01-020498-7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作家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0998 号

中国现代六作家论

ZHONGGUO XIANDAI LIU ZUOJIA LUN

李 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5.5

字数:236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20498-7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1. 宝鸡文理学院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2. 宝鸡文理学院英语语言文学校级重点学科建设基金
3.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文学视域下美国梦、中国梦演变趋势比较研究”(2016J025) (2016—2018)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中国现代文学叙述中民主问题的重要性	1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叙述中的民主问题溯源	22
----------------------------	----

第一节 “民主”概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展开	22
----------------------------	----

第二节 西方民主观念在中国的演进过程及其与文学之关系	33
----------------------------------	----

第二章 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梁启超渐进民主观和文学活动	42
---------------------------------	----

第一节 梁启超前期民主观与文学作品中的民主想象	43
-------------------------------	----

第二节 梁启超后期民主观和其文学作品对民主的理性剖析	61
----------------------------------	----

第三章 法国、苏俄思想影响下的陈独秀民主观和文学活动	69
----------------------------------	----

第一节 法国民主思想对“五四”时期陈独秀文学观的影响	70
----------------------------------	----

第二节 苏俄思想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独秀文学观念和创作的影响	96
---------------------------------------	----

第四章 欧洲文化影响下的鲁迅民主观念和文学叙述	105
-------------------------------	-----

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前鲁迅的民主观念与小说的启蒙立场	105
------------------------------------	-----

第二节 1930 年代鲁迅的左翼立场与杂文中的民主意蕴 118

第五章 英美文化影响下的胡适民主观念和文学活动 131

第一节 美式民主的熏染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易卜生主义”的 宣扬 131

第二节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胡适的民主诉求与文学创作上的变化 147

第六章 欧美文化影响下的茅盾民主观念和文学活动 155

第一节 五四时期茅盾民主观念与平民文学的主张 155

第二节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茅盾的民主—文艺观及文学实绩 160

第七章 法国、俄国文化影响下的巴金民主观念和文学叙事 180

第一节 “安那其主义”和法国大革命对巴金文学观念的塑造 180

第二节 巴金小说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控诉、对民主自由的呼唤 196

结语 西方民主观念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影响与互动 210

参考文献 232

导言 中国现代文学叙述中民主 问题的重要性

1840年西方列强发动鸦片战争，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从此被迫卷入了世界，中国也踏上了走向现代的艰难之路。学界普遍认为，民主是百年来无数中国志士仁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的一个现代化目标。诚如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所言：“从世界范围来看，所谓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就是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个封建历史漫长、缺乏民主传统、吃够专制苦头的国度来说，民主是个诱人的字眼，也是近百年来力追不舍的目标。”^①

中国现代文学是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发生、发展和成熟壮大的。现代文学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和镜子，也是转型时期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思想情感的艺术表达。现代文学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创造之间发生了深刻复杂的纠葛与互动。数十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民主观念之间的密切关联。1935年，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分析了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近代国人的民主诉求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道思想的工具……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

^① 陈旭麓：《〈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序言》，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之中。”^① 著名文艺理论家钱中文先生曾在《“五四”前我国文学观念的论争和现代化之首演》一文中对文学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较为深入的分析。此文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在其酝酿时期就受到了“提倡民主、自由、科学的反封建的启蒙思想”“反对门阀、等级制度、提倡自由爱情的思想”^②等西方文学、文化精神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如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人力图摆脱封建文学观念，建立一种充满现代民主精神的文学观念。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冕先生也指出：“在五四运动科学、民主旗帜下形成的新文学，民主意识是它的精魂。”^③ 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岳凯华也认为，“五四”文人大张旗鼓地张扬民主、科学，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一股反封建、反专制、求自由、求解放的激进社会风尚，并影响到了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主题。”^④ 基于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作家之间客观存在的事实性联系，本章将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民主之关系、中国现代作家与民主的不解之缘等方面宏观地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民主观念之间的关系，并梳理和概括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力图澄清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继而提出本书的主旨、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民主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穷则思变的历史进程的艺术表达和生动记录，也密切地融入和推动了这一段风云巨变、波澜壮阔的历史。

①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见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9-11页。

② 钱中文：《“五四”前我国文学观念的论争和现代化之首演》，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13页。

③ 谢冕：《民主精神与包容性》，见《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④ 岳凯华：《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84页。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大门从此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历经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对北京的入侵，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国的志士仁人先后发动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从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等层面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以挽救民族危亡。1861—1895年，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企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发展资本主义；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并于次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1915—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新文学、新文化作为政治改革、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用“民主”和“科学”精神塑造国民，以改造国民性，希望借此而把中国建设成独立自主、民主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民主必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学界一般认为，晚清至“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被迫启动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酝酿和诞生期。在这一民族危亡日益加剧、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努力探索救亡的道路，其中不少人对文学在塑造国民、移风易俗、改造社会方面的功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甚至是夸张的）阐释和宣传，代表人物包括晚清时期的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20世纪初的柳亚子等南社成员，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胡适、陈独秀等。

自清末至“五四”之际，以黄遵宪、梁启超和裘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从开通民智、普及教育和富国强民的目标出发，积极宣传和倡导白话文，大力主张言文合一和国语统一，开启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

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的《学术志二：文学》卷中提出“文言合一”的主张，以期达到“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目的。他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出发，将语言文字与人的智识联系起来，强调通过变革文体以便利民众，把语言文字视为开启民智、维新图强的重要工具。

裘廷梁于1898年创办《无锡白话报》，并以此作为推广白话、鼓吹启蒙的一个重要阵地。他在《无锡白话报·序》中明确提出，“中外大通，环球各国，大势尽变……欲民智大开启，必自广兴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并宣称“汰芜秽，存精英，以话代文，俾商者农者工者及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中外古今，为广开民智之助”^①。同年他在《苏报》上发表著名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不仅明确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还用“成周”“泰西”“日本”等实例证明白话文在开启民智、推进政治改革方面的实际功效。他认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前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于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②。

康有为、梁启超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这一运动在文学上的代表作家则是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他们自觉地使自己的文学活动为政治改良服务。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和《〈沈氏音书〉序》等文中，极力主张言文合一，并断言：“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③ 1897年，他发表《〈蒙学报〉、〈演义报〉合

① 裘廷梁：《无锡白话报序》，载《无锡白话报》，1898年5月。

②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原载《苏报》。转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8页。

③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叙》，支持最早出现的通俗刊物，并主张通过启蒙和教育来拯救天下。他说：“故吾恒言，他日救天下者，其在今日十五岁发下之童子乎。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①

1899—1902年，梁启超先后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明确主张。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谭嗣同、夏曾佑曾试作“新诗”，反映了改良派对新思想、新知识即“新学”的呼吁。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提出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主张，肯定黄遵宪从理论到诗作实践为“诗界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希望“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②。他的“文界革命”主张，是为适应资产阶级改革语文、“开通民智”的维新思潮而提出来的。出于同样的政治改良目的，他提倡“小说界革命”，强调小说对改良社会的重大作用，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起；欲新民，必自新小说起”^③。他还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描绘了“大中华民国”的美好蓝图。梁启超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并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还创作、翻译政治小说，极为重视文学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走向高潮，革命团体和文学社团随之纷纷出现。“南社”于1909年正式成立，参加者17人，其中14人为同盟会会员。南社成员非常重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把各种文学形式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南社的主要作家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马君武、宁调元、周实、

① 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②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9页。

③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6页。

吴梅、黄节等，机关刊物为《南社丛刻》。南社文学以诗歌为主，大体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线：此前，主题多为批判清朝统治，倾诉爱国热情，呼唤民主，谴责专制，号召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斗争，风格慷慨豪壮；此后，主题转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抒发理想破灭后的悲哀之情，斥责袁世凯的称帝丑剧，风格愤郁低沉。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5期上发表了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他提出了八点主张，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文学因时进化”，文学应当“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作文之人应当“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不作无病之呻吟”，而要“言之有物”^①。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大力声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此文成为文学革命的纲领。《文学革命论》认为文学革命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是开发文明、改造国民性、革新政治的利器，并指出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文章批判了“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封建文学观念，大胆指斥封建文人历来崇奉的“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十八妖魔”。该文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②，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③。该文明确提

①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原载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5期。引自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34—43页。

②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原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引自《独秀文存》卷一，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35页。

③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原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引自《独秀文存》卷一，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39页。

出把“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目标，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①，强调新文学的平民化、社会性和时代性特征。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青年时期的鲁迅，面对家庭困顿、民族危亡的局面，胸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伟志向，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先在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矿路学堂学习；后赴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江南班，经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多方探索“新知识”，积极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1904年4月底，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本应升入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科学习，可他因为医学对于明治维新的重大推动作用，毅然决定改学医学，9月正式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他之所以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但1905年9月的“成绩单事件”和1906年1月的“幻灯片事件”对鲁迅刺激极大，他意识到“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坦言，他开始做小说时，“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是发端于19世纪末民族危亡的特殊历史时期、因“五四”文学革命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以白话文为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原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引自《独秀文存》卷一，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36页。

②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418页。

③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7页。

主导，以现代人本观念为价值坐标的文学形态。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核心是启蒙，即反对封建文化和儒教纲常，批判专制制度，维护和张扬人的个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乐，呼唤人的解放。^①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往往非常重视文学在启蒙民众、改造国民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甚至主观地夸大了文学在政治变革方面的功能，认为语言文学方面的变革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政治变革，促进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些先驱者心目中理想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打破了封建束缚、尊重个人权利、信仰民主与科学的国家。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孕育、发生期就与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建立一个民主“强国”的民族梦想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在其近百年的发展中，也必然要继续追求、张扬和反映“民主”与“科学”精神。

二、中国现代作家与民主的不解之缘

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生、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都与民主结下了不解之缘。本书将以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茅盾、巴金等六位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这些作家都身处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渡时代，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主政治意识，并通过阅读西方政治法律书籍和出国留学等途径，从英、美、法、俄、日等国吸取了民主思想资源，他们均对民主问题有过专门的论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主观念，而且曾投身于追求民主的实际社会政治活动；其次，他们是学界普遍认可的现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在现代文学理论创新与建设、文学创作实践等方面都做出了为世人所称道的重要贡献，他们的文学观念、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与“新民”“启蒙”“立人”、个性解放、民族独立、民主建国等重大时代命题紧密联系，蕴含着明显而强烈的民主诉求，极大地推动了以“民主”“科学”为主要

^① 葛红兵：《中国现代文学精神》，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年第1期，第187-189页。

内核的新文学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民主观念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在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上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匈牙利著名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曾说：“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作品和描写里，总是民主的同盟者。”^① 梁启超等六位作家不仅是民主的同盟者，而且是民主的积极宣扬者、热情召唤者和不懈追求者。梁启超（1873—1929年）是最早在近代中国进行民主启蒙的重要思想家、政治家。他主要是以日本为中介，吸收了西方民主思想，并大力向中国传播民权、民主观念，倡导立宪政体。梁启超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散文，以及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游记《新大陆游记》《欧游心影录》等。陈独秀（1879—1942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推崇法兰西式民主与人权观念，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启蒙民众；在20世纪20年代“以俄为师”，倡导无产阶级民主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晚年时，他深刻反思苏联体制的弊端，重新思考民主问题。他在20世纪初发表了《惨世界》《黑天国》等具有浓厚民主思想倾向的小说，在30年代发表了许多反对封建专制、军阀暴政、追求民主自由的诗歌。胡适（1891—1962年）于20世纪10年代在美国留学七年，奠定了对美国民主政治的信念，回国后通过办报、议政、撰文等方式努力把中国引入民主政治的轨道。他曾大力传播“易卜生主义”，发表话剧《终身大事》、小说《真如岛》、新诗集《尝试集》和《尝试后集》，在新文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鲁迅（1881—1936年）在留学日本期间就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对新生的“中华民国”曾抱有乐观的期待。他在“五四”时期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短篇小说，深刻地揭示和批判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剖析国民性的弱点。巴金（1904—2005年）早年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有着强烈的民主、自由的诉求。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家》《春》《秋》《憩园》《寒夜》等小说，批判了不合理

^① [匈] 卢卡契：《文学与民主（一）》，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8页。

的封建家族制度、婚姻制度，表达了追求个人自由、平等和幸福生活的强烈诉求。茅盾（1896—1981年）在“五四”时期为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所吸引，20世纪20年代以后转向信仰苏俄式民主。在30年代他发表了社会剖析小说《子夜》，探讨并回答中国社会的性质等重大问题；在抗战时期发表了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锻炼》和剧作《清明前后》等，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专制和腐败，鼓舞和号召人民为抗战胜利、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从以上对梁启超等六位作家思想发展历程和文学活动的简要梳理不难看出，民主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和表述对象。中国现代文学对民主观念的表现受到了时代背景、社会思潮、作家志趣理想及文学理念、个人风格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三、中国现代文学与民主观念之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述评

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系统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根据对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资料的检索和研究，可以看出：近90年来现代文学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文学史上纷纭复杂的文学运动、思潮、流派、作家作品做出了评价，并着力于揭示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历史线索和内在规律。学者们研究了中国现代文学与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基督教、佛教、道教等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梳理了现代文学与民族主义、政治、科学、道德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分析了现代文学与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结构主义等外国文学、文化思潮的关系。

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检索，目前有5篇学术论文研究过民主主义作家、民主主义文学，分别是赵慎修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思潮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刘川鄂的《三十年代民主主义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比较论》（《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3期），文俊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民主主义文学思潮——兼论理性启蒙与政治文化的互

动关系》(《五邑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王吉鹏、王琮的《鲁迅与二三十年代民主主义文学》(《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季桂起的《近代文学对中心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以民主主义思想与国民意识为例》(《东岳论丛》2010年第6期)。然而,这5篇论文只是对民主主义文学的研究之作,并非对现代文学与民主关系问题的专门的、综合性的研究之依。

在研究专著方面,王文英主编的《上海现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刘川鄂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对民主主义文学有所论述。王文英在《上海现代文学史》中,以两章的篇幅对民主主义文学做了较为详尽的评述。在该著的第八章第一节“民主主义派”中,王文英认为民主主义文学流派是一个外延相当模糊(该派没有统一的文学观念、没有联系密切的组织)而内涵却相对清晰(承袭五四新文学传统,坚持个性主义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以巴金、老舍、曹禺为代表)的流派^①,并对巴金、老舍、曹禺和其他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情况分别以专节进行分析。在第十六章“‘民主主义’文学的最后一茬收获”中,王文英概括了民主主义文学的创作思路、内容题材、创作方法、思想题旨和文学观念,并分节依次评析了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和师陀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刘川鄂在《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的第四章第三节将民主主义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提出:“民主主义作家是指承袭五四文学革命传统,以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为创作指导思想、坚持文学为人生为平民的观念、注重文学的启蒙效用并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现代民主革命性质相吻合的作家队伍。”^②刘川鄂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民主主义主义作家以巴金、老舍、曹禺为代表,还包括郑振铎、王统照、冰心、许地山等原文学研究会及与之亲近的

① 王文英主编:《上海现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② 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